

他們把神的愛 帶給了中國

李亞丁

十九、二十世紀，神在英、美等西方國家興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福音奮興運動，隨之而來的是普世宣教運動的興起。歐美眾教會紛紛成立了宣道組織(或差會)，差派傳教士奔赴世界各地開闢宣教工場，傳福音給萬邦萬民。成千上萬神的優秀兒女因此成為福音和愛的使者，離開自己舒適安逸的家鄉，遠涉重洋，以無比的信心和勇氣，義無反顧地踏上宣教之路。許多人為此擺上了自己的一切，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價。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那些勇敢前往中國——這個遙遠而神秘的東方古國——的福音勇士們，他們通過傳福音、建教會、辦教育、設醫院、興改革等方略，不僅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帶給中國人民，更把神的大愛普及萬人。他們的事蹟可歌可泣，他們為中國人民所做的善行義舉，為中國社會所作出的貢獻，應該被中國人永遠紀念。因篇幅有限，本文只從兩件史實述及西教士的嘉言懿行所彰顯、所實踐出來的上帝之愛。

一、傳教士與禁煙運動

由於種種歷史偏見和政治宣傳，許多國人對西方傳教士有著諸多的誤解和敵意，甚至認為他們是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」、「文化侵略的工

具」等等；更常常把他們和「鴉片戰爭」聯繫起來，好像他們都參與支持「鴉片戰爭」，來中國就是要向中國人兜售鴉片，看他們無異於「鴉片販子」。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誤解，事實非但並不如此，更是恰恰相反。讓我們來看一看史實吧：

1. 力陳鴉片的危害

不錯，西方傳教士大舉進入中國之際，正值鴉片戰爭之後，清政府除割讓香港，賠償巨額軍費外，還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。英國商人繼續將鴉片大量輸入中國以謀取暴利，而受害最慘烈者乃是中國百姓。他們被鴉片荼毒，終日生活在煙榻上，了無生氣，健康日漸衰殘，體質更趨羸弱，被譏為「東亞病夫」。然而，西方傳教士卻始終反對這害人匪淺的鴉片貿易，認為這是英國極不光彩的劣績。當時在湖北宣教的英國傳教士楊格非(Griffith John)對鴉片貿易深惡痛絕，一心為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奔走呼號，並於1882年寫出《關於鴉片貿易的簡明問答》一書，



評擊鴉片貿易的罪惡。他也多次撰文苦勸中國人，指出吸食鴉片有百害而無一利，應拒之千里之外，切勿接觸為上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多次透過媒體，義正辭嚴地向英國政府上書，苦諫停止向中國銷售鴉片，因為這種貿易會造成中國人對傳教士和福音產生強烈偏見，讓他們無法了解何以同屬英國人，既傳揚救贖的福音，又帶來具有毀滅性的毒品。楊格非發動在華英國傳教士，利用他們和母國教會通信的機會，向各自母會報告鴉片在中國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惡果，並請求會眾為禁止鴉片之事切切禱告。雖然楊格非的諫言，未能立時遏止英國政府的鴉片貿易，但他維護中國人權益的勇敢言行，令人欽佩，也為後來成功禁銷鴉片奠定了基礎。

另一位英國傳教士，著名漢學家理雅各(James Legge)出於一個基督徒的良知，畢生反對鴉片貿易，認為



「這是一種罪惡的交易」。在1878年倫敦舉行的一次抗議鴉片貿易的集會上，理雅各慷慨陳詞，力數鴉片對中國人民之危害，為中國人請命。他並且引用舊約先知的話，告誡英國政府：「停止作惡，學習行善」，同時主張英國政府立法，禁止向中國傾銷鴉片。

2. 發起成立中國禁煙會

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士杜步西(Hampden Coit DuBose)更將反鴉片之事付諸行動。他於1872年偕新婚妻子來中國蘇州宣教，隨著他們深入民間與當地百姓親密接觸，杜步西逐漸發現蘇州一帶吸食鴉片問題之嚴重。雖然林



則徐禁煙運動已經過去30多年了，鴉片戰爭也已成爲歷史，但他所看到的是鴉片依然流毒甚廣，遺害無窮，令人觸目驚心。因此他內心生出一個強烈的感覺，並促使他做出決定：我要為中國人做些事。於是杜步西和美國監理會傳教士、博習醫院創始人柏樂文(William Hector Park)等西方傳教士(多位是醫療傳教士)發起成立了中國禁煙會(Anti-Opium League in China)，由杜步西擔任首任會長。這是中國最早的禁煙會，他們宣傳戒煙，上書中國政府，並在英美兩國為中國人奔走呼號。隨著禁煙會聲勢漸大，吸引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進來。杜步西於1895年上書英美政府要求停止向中國銷售鴉片；他還不斷地寫信給美國參議員呼籲。在一封寫給美國參議員麥克勞林(John McLaurin)的信中，杜步西呼籲美國應負起道德責任，因為它正在和英國一樣，以損害中國人的健康而獲利。同時杜步西還徵集了一份超過1,000名在華傳教士簽名的請願書，上書給光緒皇帝。皇帝因此下詔，其詔書幾乎逐字照搬杜步西請願書的內容，禁止鴉片貿易和吸食鴉片。至今，在蘇州基督教使徒堂院內還豎有1910年該堂教友公立的「杜步西先生紀念碑」，上面記錄著杜步西當年的禁煙事蹟和眾多傳教士的名字。

1899年，禁煙會出版了影響深遠的*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* (《100多位醫師對中國的吸食鴉片問題之看法》)一書。這是一本由100多名專業醫生參與的調查報告，書中闡述了禁煙會的宗旨，力陳鴉片的危害，最終影響了公眾輿論，起而反對鴉片貿易。在杜步西及其同仁的不懈努力下，他們的禁煙之舉終於獲得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(Theodore Roosevelt)、美國國會，以及萬國禁煙會的支持。1906年，禁煙會取得成功，英國國會聲明鴉片貿易「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」。

1910年3月，杜步西在蘇州大衛巷(今倉米巷內)寓所內去世。他在蘇州宣教長達38年之久，他的慈

言善行感動了無數蘇州人。在他去世後，不少人自發地紀念他。不久，他兒子杜翰西(Palmer Clisby Dubose)又前來蘇州接續他的工作。1920年杜翰西翻建了父親所建的教堂，為紀念杜步西，特命名為「思杜堂」。1951年，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會反帝愛國運動中，「思杜堂」牌匾被除掉，改名為「使徒堂」，直到今日。

二、傳教士與「天足運動」

中國婦女纏足起源於五代，經過宋代，至元明而盛行。滿清帝國建立後，雖曾一度嚴禁婦女纏足，但已成為風俗，在民間根深蒂固，纏足禁令被迫取消。那時，女孩子從四、五歲起即開始纏足，直纏到七、八歲才算告成。經過纏足後的畸形小腳，被稱為「三寸金蓮」。清代小說《鏡花緣》作者李汝珍在其書中活現了纏足過程：「先用白礬灑在腳縫，五個腳指緊靠一起，腳面用力彎成弓狀，然後用白綾纏裹，纏上兩層，用針線密縫；一面狠纏，一面密縫，纏完後，腳如炭火炙燒，疼痛難挨，隨後日子還要他人攙扶走動，以活絡筋骨。如此日復一日緊緊糾纏，並用藥水薰洗，不到半月，腳面彎曲，折作四段，十指腐爛，鮮血淋漓。久而久之，腐爛的血肉變成膿水，流盡後只剩幾根枯骨……。」千餘年間，中國婦女飽受纏足之苦，所謂「小腳一雙、眼淚一缸」，是這一人為慘劇的真實寫照。如此「金蓮」使女子們舉步維艱，氣血不和，體弱多病，為社會無端地製造了大量的殘疾人，從而加重了社會負擔，也大大影響了社會的發展。

1. 發起天足運動

史學家大多認為，近代反纏足運動的興起，與來華西教士有很大的關係，他們是早期反纏足運動的鼓吹者和推動者。首先發起「天足運動」的人是英國傳教士麥克高望牧師(Rev. John MacGowan)。他於1874年率先在廈門建立了一個擁有60餘名婦女

的「天足會」，規定凡入會的婦女不得纏足。這是目前中國第一個有史可考的反纏足組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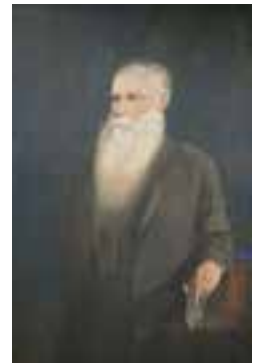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位是英國的立德夫人(Mrs. Little)。1878年，在傳教士的贊助下，立德夫人偕10位西國婦女在上海發起了「天足會」，凡入會之婦女均不得纏足。繼而在無錫、蘇州、鎮江、南京等地設立分會，利用基督教廣學會出版書刊來宣揚反纏足主張，並希望藉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，再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。廣學會總幹事、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的夫人也是「天足會」的骨幹會員。她們深深知道「纏足難，反纏足更難」，因為所面對的不僅是千年來中國父權和夫權的牢固壁壘，更是千年來中國女性被規訓了的身體和思想。雖然立德夫人等當時所能做的，以及所產生的影響還很有限，但她們深信，不纏足的種子已經撒入泥土，只待時機成熟，天足之事必能風行。

張，並希望藉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，再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。廣學會總幹事、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的夫人也是「天足會」的骨幹會員。她們深深知道「纏足難，反纏足更難」，因為所面對的不僅是千年來中國父權和夫權的牢固壁壘，更是千年來中國女性被規訓了的身體和思想。雖然立德夫人等當時所能做的，以及所產生的影響還很有限，但她們深信，不纏足的種子已經撒入泥土，只待時機成熟，天足之事必能風行。

2. 林樂知與《萬國公報》的影響

在廢除纏足陋俗，推動天足運動一事上，廣學會《萬國公報》主編、美國傳教士林樂知(Young John Allen)功不可沒。他站在基督徒信仰立場上看婦女纏足是「負上帝造人之本真」(〈纏足論衍義〉載《萬國公報》1889年4月)，也就是說這種蓄意



摧殘人的肉體與靈魂的行為，是破壞了上帝造人的意願。在基督教信仰中，世間男女，無論他們人生處境如何，均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。林樂知在《萬國公報》上發表大量言論，反對中國人對婦女身心健康的摧殘，表現出一個基督徒所具有的憐憫之心與救世情懷。林樂知看到纏足實際上是一種在

腐朽文化支配下，對廣大婦女施加的刑法，其醜陋程度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風俗中對人性的摧殘。「以布條緊紮，使其肉糜骨折，痛楚難堪，致生成之善足，變為殘跛之廢人，畢生艱難，趨步不便，欲求其小，不顧其苦，貪其美，不計其害。」「皮肉潰爛，疼痛號泣，艱地步履，忍受終身之苦厄。」「觀纏足之時，緊紮呼痛，母即酷打其女，強使之痛楚難堪，旁觀之人，每為傷心，其父母反鐵石心腸，絕無惻隱。嗚呼！殘忍若是。」(抱拙子：〈勸戒纏足〉載《萬國公報》1882年10月)。更讓林樂知無法忍受的是，中國人居然把這種毀壞人性的惡劣行為，視為是一種趨之若鶩競相讚歎的「美」。在其〈裹足論〉一文中，他直斥其謬：「如果一個女人，她哪怕是三寸金蓮，而縮頸粗腰，安望其步履珊珊耶？美者，不因乎裹足而愈美；醜者，不因乎裹足而不醜。」(《萬國公報》1878年8月)

林樂知進一步看到，纏足不僅危害人的心靈與健康，而且還對整個民族的血脈相傳產生消極影響。他從遺傳學角度說明這種毒害民族的醜惡行為：纏足勢必造成婦女身體的衰弱，身體的衰弱就會造成身體發育的障礙，這樣生下的孩子就可能身體單薄，智力低下。此外婦女由於身體的殘疾，會對性格造成重大影響，最明顯的是膽小怯弱，這勢必又影響到孩子身上。中國之衰落，婦女的纏足之害難辭其咎。由於婦女纏足，使中國一半人口變成殘廢，這樣的國家焉有不弱之理？故而纏足是「違天意、蔑古制、招痼疾、戕生命、妨生計、廢人倫和壞心術」(〈纏足兩說〉載《萬國公報》1895年5月)。而今日之中國要強大起來，必須要改造人，使人具有強健的體魄，做到這一點必先除去像纏足一樣的各種惡俗，鏟除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，按照自由平等之理來重建中國人的價值觀。

纏足既然對個人、家庭、國家都造成如此巨大之危害，那麼怎樣才能革除此弊呢？林樂知等傳教士認為「病根甚烈且久，非用猛法以治之」不可。他們仗義執言：首先是政府要以行政手段強制廢除

纏足之俗，官員在這方面要起帶頭作用，譬如三品以上官員所生女兒，不得纏足，否則治其有罪。其次用各種方法向中國人宣傳此等惡俗之醜陋，逐漸廢除此俗。第三是採用經濟制裁手段，「按戶按口，遍量其足，凡小三寸者，日捐錢30文；足大至5寸半，日捐僅錢5文；若至6寸即可免捐。纏更小者照數加捐，放略大者照數減捐。若竟有小逾3寸者，則加捐至日50文」(〈天足會陳詞〉，見李又寧、張玉法編《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-1911》，第855頁)。

為了扭轉中國人對婦女的態度，以改變中國婦女的地位，林樂知在中國基督徒任廷旭的協助下完成了21冊的《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》(*Women in all Lands*)一書，於1903開始陸續出版。該書以婦女地位的高低為文明興衰的指針，對各國文化進行比較和研究。除文字之外，還附有圖片一千餘幅以吸引讀者。根據「廣學會」成立40周年時(1927年)的統計報告，在其最暢銷的書籍中，此書高居第二位。林樂知寫這部書的目的是以「各國女人之地位，與其看待女人之法」來考查中國對待女人的態度，以及在各國之中，居於何等地位。他一再強調一個國家的婦女不解放，絕無振興之望，這對貧弱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。「所謂釋放女人者何也？釋放世人，固為第一要務；但釋放女人上端，實為拯救東方諸國之良法，而中國尤亟，因對癥發藥，非此不能奏效也。」(〈論中國變法之本務〉載《萬國公報》1902年6月)林樂知反覆告誡中國人，婦女的地位和國家強弱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，以此喚起人們對婦女解放的重視。

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婦女解放上的所作所為，衝擊了封建觀念，啟迪、刺激了中國人的思想。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反對婦女纏足的思想與行動，就是受到《萬國公報》上文章的啟發，從而於1883年在家鄉南海縣創立了「不纏足會」。梁啟超繼而在上海也成立不纏足總會，會規中明確規定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；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

得娶纏足之女；凡入會人所生女子，已經裹足者，如在八歲以下，須一律放解。在中西人士的共同努力下，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，在民間造成風氣，地方政府官員也來參與，以至於最後連慈禧太后也親下懿旨禁止纏足。到了民國時期，廢除纏足運動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，有計劃、有組織的推動下，更加有成效。到民國30年代左右，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，中國婦女中基本上不再有人纏足。延續千餘年的纏足陋習，在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有識之士數十年之不懈努力下，終至絕迹。如果當初沒有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努力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無疑將會推遲幾十年。從這方面來說，正是林樂知這些人使中國婦女在萬馬齊喑的黑暗社會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，這不能不說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一大貢獻。

3. 西方傳教士極力反對陋習

西方傳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婦女，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強而有力的衝擊。傳教士興辦女學、傳播男女平等觀念，也為中國社會樹立了尊重婦女，提高婦女地位的榜樣。其實，西方傳教士何止反對纏足陋習，他們在反對童婚、納妾、奴婢制度、包辦婚姻、販賣婦女等中國社會的傳統陋俗方

面，均不遺餘力，也大有貢獻。他們在中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女子中小學和大專院校，為中國培養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識份子，使她們和男子一樣活躍在中國的教育、科技、醫護和法律等各個領域。雖然不能說傳教士是移風易俗、提高婦女地位的唯一推動力，但他們在這方面首開風氣之先河的功勞，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，亦為後來中國人自辦之女子學校提供了寶貴的借鑑。可以說，他們是率先引導中國人脫離愚昧無知的思想導師，更是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。

聖經說：「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」(約壹四19)。這些西方傳教士之所以能如此愛中國人，乃是因為他們先經歷了神的愛，然後才能夠以神的愛來愛那些看上去並不可愛的「鴉片煙鬼」，以及那些格外需要關愛的「小腳女人」，並且幫助他們從根本上解除痛苦。正如英國傳教士戴德生(Hudson Taylor)所說：我愛中國，乃是因為我愛基督。因此我因愛基督而為中國人所做的再多，也都微不足道了。

(作者為教會歷史學者，現居北美，從事寫作、教學與宣道)